

2019年春季瑞典哥德堡大学

2019-09-11 08:34:50

2019年春季学期，我短暂告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来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区别于像斯德哥尔摩或是马尔默那样一说出名字便能在脑海中浮现出蓝色大厅中觥筹交错的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或是被米白色沙滩莫迪兰色系的Ribersborg海岸的旅游城市，隆冬的哥德堡与它工业城市的头衔一样肃穆硬核。而这次交流，让我在生活、学习中渐渐打开了这座城的外壳，在触碰与我航迹交错的人们柔软内核的同时，自己也变得精神明亮。在填报出国交流志愿时，我曾为北欧国家作为世外桃源的乐土标签所沉沦，仿佛一种向死而生的冲动，求学仿佛只能退居后位。事实上，当渐渐融入哥德堡的文化语境，北欧人潜在的生活逻辑与自我衡量框架，使我不自觉地在学习中乐不思蜀。高纬度国家的极昼与极夜模糊着时间判断的概念，在可以归咎于自然不可抗力力的自我放纵边界疯狂试探。但瑞典人将一切平衡和约束得如此自然：极夜降临的季节，玻璃结构的市立图书馆灯火通明，黄光熹微的自习间成为夜生活业已打烊的哥德堡最热闹的去处；极昼将至，店铺也不会因为拉长的白昼而延长营业的时间，八点过后，“夜”生活照常在日光过于富足的露天咖啡馆中恍惚的开始；青年政治参与度极高，政治学系的课程是多元立场唇枪舌剑的修罗场，但离开教室，庙堂之高在谈笑间成为过眼云烟。节制与自律，是我所见到的瑞典人的生活“制度”。工作日学习，双休日出游。每每从图书馆披星戴月而出，闲庭信步于鸥声阵阵的国王花园，或在咖啡馆消磨完极夜来临前的最后一点晚霞，抑或是瞥见报纸上的打折消息，踏着优惠最后期限的鼓点，在与瑞典人一同的“锱铢必较”中享受烟火人间的乐趣。不管怎样，橘黄色的万家灯火永远是瑞典人漂泊的最终航站。不用戴上西方“开放”的镣铐和刻板印象逼迫自己夜夜觥筹交错，也不刻意追求一座城那虚无缥缈的头衔与纸醉金迷的表象，节制、自律，让我爱上哥德堡。在哥德堡大学上课，这一种从日常和文化渗入的“节制”感代入了我的学术生活中。在新闻学被归入社会学系的状况下，我在交流中选读了比较媒介制度、欧盟与民主、全球化研究、媒介化社会四门课。哥德堡大学的课程设置很特别，一节课程从入门到结业全在一个月中完成。这一开始对初来乍到的我并不十分“友好”：第一个星期快速入门，第二周的小组作业便接踵而来，第三周立刻独立进行案例研究，最后一周在对期末报告立论的不断推翻和打磨中意犹未尽地与课程告别，此时心中快要落下的石头却又在教务系统中更新的下一门课程大纲中悬了起来。但适应课程节奏后，我的生活在张弛有度的韵律中回归了朝九晚五的节奏，贴题的实用型作业在增强与意识形态各异的各国同学的交流合作中让我饱尝知识吸收、内化、输出的快乐与满足。置身于与故土相隔将近半个地球的北欧，走出语言和既定观念的舒适圈着实需要下一番功夫，而在课堂上关于敏感话题和政治命题的讨论也彻底让我“不舒服”。国际交流项目中的“交流”并非是平等的，差异在孤身一人时显得更加尖锐。在Comparing Media Systems课堂中，中国大陆在助教所播放的最新版PPT上依然被定义为没有言论自由的Dark Area；按国家随机分组，我经历了韩朝两国同学因家国立场分道扬镳，几经换组波折；在由不熟悉构建出的友好之外，一小部分香港学生依然会和我说：“I don't speak Chinese, we can communicate in English.”意识形态是新闻专业课程永远绕不开的命题，在政见、立场的交锋中，我也常常感到无措：是懦弱地自我“东方主义”，顺从他人的偏见以寻求虚假的合群？还是冒着以卵击石、被当做“异类”的风险加以反驳？我选择了将交流放到餐桌上。以美景和校园生活为话题的切入点，总是能让谈话变得轻松愉悦。我与英国籍的助教约了午餐，与她聊起了自己在报社的实习经历，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媒介制度和言论自由。西方视角忽略了中国新媒体以及社交平台在议程设置中的巨大力量。助教鼓励我以此为撰写研究报告，并且在课堂上发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课堂报告后，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几位同学课后依然对中国新媒体充满了好奇，并邀约我一起吃午餐。“餐桌外交”得以延续。偏见是一种沉疴，我不指望一次简短浅显的课堂报告就能给PPT中的Dark Area填上色彩，但交流至少松动了刻板印象的一颗螺丝钉。哥德堡给了我与他人交流以及看待世界的一扇窗，我也时常想着为它留下些什么，留下一个中国女孩曾经生活过的、有意义的、鲜活的痕迹。在Coordinator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哥德堡大学中文系志愿助教队伍，参与每两周一次的课余中文教学活动。在中文系，我认识了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瑞典朋友，但最触动我的是当地的华裔们对民族认同的追寻。瑞典华裔占了不足50人的中文系的三分之二，其中有许多朋友身上几乎已无任何中国的痕迹。“父母用中文对话，孩子用瑞典语作答”的场景，半年之中对我来说屡见不鲜。但“Back to China”而非“Go to China”的愿望我依然能在他们口中常常听到——那是一种对寻根的本能和渴望。最后一堂课，许多同学唤我的中文名道别，而平时用瑞典姓名互称的华裔们此刻也能清晰地发出彼此中文名的读音，我感到自己成了他们寻根之旅上的一个接力人，这是最高的无薪之酬。在哥德堡交流，我带走的是另一所高校所给予的知识，欧洲几座博物馆的底蕴，各国友人的祝福，以及更独立的自己，留下的是几本中文教案，一些“五月花”儿童慈善机构的捐款，以及对中国的新鲜印象。“做一个中国新闻人”，宛若《喜剧之王》中倔强的台词，这次交流，或让我更加坚定从容。